



天外『求索』文库

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 儒学本位据旧开新

李承福◎著

南開大學出版社



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 儒学本位 据旧开新

李承福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本位 据旧开新 / 李承福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8
(天外“求索”文库)
ISBN 978-7-310-05648-4

I. ①钱… II. ①李…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②儒学—研究 IV. ①K203②B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7391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运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2 插页 274 千字

定价：57.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天外“求索”文库

天外“求索”文库编委会

主 任：修 刚

副主任：王铭玉

编 委：余 江 刘宏伟

本书为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论钱穆中国式民主政治的当代价值”（项目编号：2017SK167）的阶段性成果。

序

钱穆(1895—1990),字宾四,1911—1922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从1923年秋开始,他写出160多篇考辨文章,形成《先秦诸子系年》初稿。蒙文通先生看过初稿之后,大为惊叹:“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①1929年,顾颉刚读《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也感慨地说:“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②1930年6月,钱穆受顾颉刚邀约著写《刘向歆父子年谱》,该书根据《汉书·儒林传》,围绕刘向、刘歆父子的历史活动进行梳理,非常有力地反驳了康有为主张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观点,指出《新学伪经考》有28处不合史实。钱穆的观点引起学界轰动,并得到学界主流的认可。经顾颉刚推荐,1930年钱穆担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正式融入学术界。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阵容中,“现代新儒家”无疑是其中的一支劲旅。经过百年文化激荡,这支劲旅愈加体大声洪,已然在海内外产生了三代新儒家人物,这些都是需要专题研究的。仅以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人物而言,学界公认的就有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勱、冯友兰、贺麟、钱穆诸大家。然而以上大家之学术贡献,也并不尽在同一个方向。比如,现代新儒家学者最懂现代国家制度、精研民主政治的是张君勱;通晓道德本体论哲学、深契儒佛合一之理的是熊十力;最早注意中西印文化比较,而又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是梁漱溟;精于中华文化典籍,极力推介儒家诗书礼乐的是马一浮;以现代欧美

^① 钱穆:《师友杂忆》,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5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47页。

^② 钱穆:《师友杂忆》,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5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49页。

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照，接续传统而又开续新篇，同时极具学院派哲学义理特色的是贺麟和冯友兰；而钱穆则是我国现代新儒家学者中，最具史学涵养，深通古今之变，酌古论今的史家通儒。李承福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研究钱穆学术思想，且有最新进展的优秀作品。

李承福在其博士学位基础上所完成的《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本位 据旧开新》一书，着力从四个方面揭示了钱穆的儒学观和中国文化观。

第一，该书揭示钱穆的儒学观和历史文化观缘起于崇高的家国情怀。

钱穆研究中国文化，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学术语境、起点和归宿。抗日战争初期，中国节节败退，国人内心极度悲愤。在此前后，中国思想界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展开了多次有关中国新文化的论战，如东西文化论战、白话文论战、科玄论战、全盘西化论战等。在这特定的现实与理论情境下，钱穆正式研究中国文化，于1938年开始写《国史大纲》，并将所有问题归结为三大问题：一是中国文化是否根本要不得，应该全盘西化；二是人类文化是否没有差别，必然遵循同样的道路进化；三是中国如何实现文化自救。钱穆经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充分的认识，对中西文化细致的比较，最终形成了以据旧开新为原则，以儒学本位为路向，实现中西会通的文化观。

钱穆刚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就深刻地指出：“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①他反思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中国文化观念，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揭示中华民族可以永远长存的文化依据，反省日本侵华背后的西方文化病症，从根源上论证了日本侵略最终必然失败，并阐释中国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新文化该走何种道路。钱穆正是在这一时间节点和这种运思历程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展望未来中国的新文化。

^① 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页。

第二，该书揭示了钱穆独特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体系。

该书认为钱穆研究中国文化有四个视角、一个宗旨，构成了其完整的学术框架。首先是四个视角：第一是从哲学上反思文化学本质，第二是从整体上研究中国文化演进史，第三是从中国文化的性质、特征等以及文化七大要素和具体问题方面，分门别类研究中国文化，第四是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研究中国文化。他的文化观有一个宗旨，即展望中国文化未来前进的方向，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这五个方面，是会通在一起的总体，从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贯通到其他方面。该书探讨钱穆的文化观，也大体上从这些方面入手，力求真实反映钱穆的文化观。

第三，该书揭示了钱穆的中外互动的文化交流理念。

钱穆认为物相杂为文，求相和相通为化，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会通，本身也是文与化。中西文化各有特殊性，西方文化绝对不是完美的，中国文化也定不是一无是处。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是去中国化，而是要中国化。中国的文化自救、中西会通，首先要懂得保留中国文化生机，树立民族自尊、自信，只有“据旧”才能“开新”。其次要懂得中西文化各自的利弊得失，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走中国自己的新路，才算是据旧开新。再次要懂得世界文化的走向和人类文化前进的驱动力，不在于强大的科学、富裕的经济，而在于人道的生活，这同儒家道统精神一致。因此，中国开创新文化，既要复兴文化，树立民族尊严、自信，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又要中西会通，结合时代潮流，开创有中国特性的新文化。这条道路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简单折中，更不是复古。这就是钱穆坚持了 50 多年的文化观。

钱穆研究中国文化，既有对传统文化较为全面的认知，也有对新文化运动和全盘西化论偏颇的揭发，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新阐释，更有对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仍致力于探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新文化的终极关怀。难能可贵的是，其文化观从青年时期形成雏形，到中年成熟，晚年臻于完善，在学理上一以贯之，没有动摇过，成为其终生信念，并身体力行。可见

钱穆是一位真正跨时代的大学者。

第四，该书揭示了钱穆历史文化观的基本精神。

该书命名为《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本位 据旧开新》，界定“儒学本位”与“据旧开新”两方面为钱穆文化观的总精神。

“儒学本位”，是钱穆针对中国文化复兴和中西会通所提倡的路向。钱穆反对以“中国文化落后论”否定中国历史，反对以“全盘西化论”去中国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为中西会通的前提，坚信儒家思想能融合西方文化，儒家的人道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根本精神。钱穆认为应当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成果，认为现代科学是人类公共的财富，旨在无限求真，但其价值是中立的。西方宗教旨在追求心灵无限的善，却违背科学的真。资本经济旨在实现有限物质的善，民主政治旨在实现部分人际的善。就人类生活的价值而言，他反对科学万能论和经济万能论，认为道德和政治的人文精神，高于科学和经济的工具理性，道德应当指导政治，指引科学和经济的发展。钱穆指出：我们应当重新阐释中国文化的人道精神，以健全的至善观念为指导，学习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商业资本经济、民主政治，让新道统精神驾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两匹野马；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必须建立在中西既有文化基础上，面向人类未来开新。“据旧开新”，是钱穆针对中国救亡图存和文化自救所坚守的原则。此处的“旧”有两个含义，首先是指中国旧有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钱穆认为中国的“旧”，就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和元气，没有了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中国的文化革新就无从谈起。旧是新的根底和本体，“据旧”是“开新”的前提。“旧”其次是相对于未来世界的新文化，中西现今的既有文化。钱穆认为与其现在跟着西方文化跑，步步追赶，不如展望人类文化的走向，依据中西既有文化的利弊得失，开创中国新文化。钱穆反对从西方的观念出发，评价中国文化，反对从空想的理论出发，设计中国新文化。他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得出了“据旧开新”的文化复兴结论。钱穆认定，只有按照儒学本位的路向、据旧开新的原则，才能跨越体用、新旧、变常、中西的隔阂，吸收

中西文化的优长。

总之，钱穆的文化观，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观念：坚持儒学本位的路向，据旧开新的原则，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救与更新。因此，该书以《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本位 据旧开新》为题，展开钱穆文化观的学术理论。

钱穆是较早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其文化观的语境与深度，早已超出了新文化论战中的西化派与国粹派。他提出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在做出定性判断之前，先得回归到历史和事实本身，然后再做解读和阐释。因而钱穆先以史学家面目出场，后以文化史学为主题展示其文化观。钱穆深化了中国民族精神内涵，充分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突出了中国文化对未来世界新文化的贡献，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他指出，中国文化以道德为中心的人道精神、以融合为特征的民族精神、以自强为主导的历史精神，是我们中国新文化最该继承的宝贵文化资产。我们可以借助钱穆宽广的文化视野，考察中西文化的各自特点，对深入地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理解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化大潮，树立民族自信心，都有极大的帮助。

钱穆“儒学本位、据旧开新”的文化观，为我们建设 21 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资源，对当今中国文化复兴有极大的价值。钱穆为我们揭橥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特别是人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能有效地规避西方现代性问题。中国的文化复兴，就在于以健全的人道精神和科学的实践精神为中心，适应时代趋势，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钱穆注重从中国历史与文化出发，理解中国的社会，并展望中国的未来，同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民族复兴，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相信该书对深入研究钱穆的文化观，必定有巨大的现实和理论价值。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周德丰

2017 年 9 月

目 录

第一章 钱穆阐释文化学要义	1
第一节 文化学相关概念与文化学一般方法	1
第二节 文化阶层、目的与要素	11
第三节 文化类型与文化更新	27
第二章 钱穆纵览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与精髓	42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42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83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07
第三章 钱穆解诠中西文化的差异	130
第一节 中西的历史比较	131
第二节 中西文化的要素比较	157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差异总述	175
第四章 钱穆展望中国新文化与世界文化走向	191
第一节 近代中国文化危机：文化自救与据旧开新	192
第二节 中国文化更新：中西会通与儒学本位	220
第三节 世界文化的走向：多元共处与集异建同	247
参考文献	279

第一章 钱穆阐释文化学要义

20 世纪初期,我国学者救亡图存,寻求变革,从政治革命深入到文化革命,把创建中国新文化看作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关键。钱穆从 1938 年写作《国史大纲》开始,正式以历史学特有视角,理解文化,并建立了一套文化学理论。钱穆的文化学研究,从文化、文明和文化学等概念和方法,到文化层次、目的、要素,再到文化类型和文化更生,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历史性。它突出了大群人生的精神生活,体现出人文主义色彩。钱穆的文化学,是其文化观的基础理论,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对我们探讨文化问题,有巨大的理论价值。

第一节 文化学相关概念与文化学一般方法

钱穆的文化学,厘定了文化、文明和文化学等相关概念,将文化同地理、民族、历史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还探讨了文化学研究的方法论。

一、文化、文明与文化学概念

近现代中国学者,对文化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差异比较大。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包括生存的需要和活动力与由此产生的物质业果,精神的需要和活动力

与由此产生的社会和思想业果^①。胡适认为：“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和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思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②梁漱溟则提出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③季羨林谈文化含义时说：“就是包括人类已通过自己的劳动，这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这就叫作文化。”^④庞朴谈文化的含义，则更加详细：“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含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钱穆的文化、文明概念不同于上面所列学者。

1. 文化的概念与特性

钱穆严格区分文明与文化。他提出，在欧洲原本文明与文化就有区别，civilization 为文明，culture 为文化，英国商业经济发达，现代城市兴起比较早，英国人使用 civilization 一词，以表明物质文明是英国引以为荣的成就。而物质文明不断从英国传入德国，德国要表明自己的成绩，则用 culture 一词，强调在自己的国土上，通过农耕生产形成的农业生活方式，反映了德国人在国际争取自己民族

①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第39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98页。

② 胡适：《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集》（第4册），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④ 季羨林：《季羨林自选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⑤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81页。

文化地位的真实内心^①。

他说：“‘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惟文明偏在外，属于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于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往外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业而产生。”^②文明与文化在一具体事物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很容易混淆，但它们的实际指向是不同的。譬如我们可以直接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和生产线，但我们不能立马就学到西方的科学精神，这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差别。

钱穆对文化的界定，先从中国文字渊源解释，持广义的大文化立场。《易经》上说物相杂为文，求相和相通为化，“文”是条理，是花样，是色彩，就是指不同事物相杂在一起形成的花样，红的绿的拼在一起的花样就是文。中国古人讲文，有天文、地文、人文。男女结为夫妇，就是人的花样，老人、小孩、前代、后代，成为父母子女，构成家庭，就是“人文”，如《易经》上说“人文化成”。从这些人文中变化出其他许多花样，就是“文化”，其中变化的原因和规则在于“道”。文是各种色彩和花样，花样色彩配合得鲜明，使人易生刺激，就是“文明”，如《小戴礼》上说“情深文明”，就是指夫妇感情越真挚，关系越深切，外界看来这对夫妇配合就越鲜明。

就文化的概念与界定，钱穆这样论述：

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惟此所谓人生，并不指个人人生而言。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人生，却不可说是文化。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得目之为文化。

文化既是指的人类生活之综合的全体，此必有一段相当时期之

^① 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1页。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页。

“绵延性”与“持续性”。因此文化不是一平面的，而是一立体的，即在一“空间性”的地域的集体人生上面，必加进一“时间性”的历史的发展与演进。文化是指“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①

钱穆明确文化就是“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具体包含若干方面的含义与特性：

其一，文化是大群的生活，是全社会生活的总体，不是个人的零碎生活。文化也在各个个人身上表现，文化是大流，个人是大流中的水滴。个人只在文化之中生活，受文化规范、指导，例如孔子、释迦牟尼、耶稣三人，也仍只是集体文化的产物。

其二，文化是生活的各部门、各方面的综合，不是单指学术思想，也不是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更不能等同于社会风俗，而是所有客观与主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综合。

其三，文化在空间上有地域性。自然环境是人生活的舞台，是文化依存的物质条件，对文化的起源有极大的影响，文化也影响和改变着环境。

其四，文化在时间上有绵延性与持续性。我们在出生前，文化就已存在，人有生、老、病、死，但文化可以长青，未必会死亡。断定文化的生与死，就看该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否还在延续。如古埃及文化只剩下一些死的遗物，活的精神没有传承，历史也没有保存，即便还有古埃及人的血统在世，但古埃及文化确证无疑是终结了。

钱穆对文化的主体、时间、空间和整体都做了界定，突出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性，以至于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伸展。他认为割开历史大流横断截取一小段的大群人生，同把整个民族生活抽取出单个方面一样，以此分析文化意义和评判文化价值都是不可靠的。

^① 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页。

2. 文化学的概念

钱穆对文化学的概念和文化的终极目标都做了界定：

文化学是研究人生意义的一种学问。自然界有食物，而可以无意义。进入人文界，则一切事物，必有意义之存在。每一事物之意义，即在其与另一事物之内在的交相互联处，即在其互相关系处。人生意义，概括言之，有两大目标：

一、是多方面之扩大与配合。

二、是长时期之延续与演进。

此即中国《易经》上所谓的“可大可久”。任何人生之某一方面，某一时期，若与其他方面其他时期之联系性割绝而孤立了，则不仅无扩大、无演进，而且其本身亦将无意义可言。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文化学是研究人生价值的学问。价值便决定在其意义上。愈富于可大可久的意义者，则其价值愈高。反之则愈低。

于是我们暂可得一结论：“文化学是就人类生活之具有传统性、综合性的整一全体，而研究其内在意义与价值的一种学问。”^①

接着钱穆明确了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本质内涵。他指出，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在大群人生中的文化这一客观存在，“文化尽管必须在每一个个人人生上表现，但个人人生究竟无法超脱文化而存在。文化是规范着每一个个人人生，指导着个人人生，而又超越于每一个个人人生之外的客观存在。这一种存在，即是文化学的对象”^②。文化学实质上就是研究大群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学问。钱穆的文化学立足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角度，而非立足于表现在外部物质系统的文化现象，因而他的文化学也是人文主义的文化学。

在钱穆的文化学中，大量的范畴都富有独特的含义。其中文化

① 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9页。

② 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页。

的“新”与“旧”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从同一个文化的历史演变来界定的。以中西文化为例，对中国文化来说，西方文化首先是异文化，而且是不同类型的异文化，并不直接就是新文化，只有当西方文化被中国吸收和改造之后，才能成为中国的新文化，如果西方文化不经中国的改造，直接搬过来，那还是西方文化，而且是西方传承了上千年的旧文化，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化，更不能称之为中国的新文化。我们应当明确钱穆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些范畴，才能理解他的文化学和文化观。

二、文化相关范畴的判断

钱穆探讨文化，非常注意文化系统的整体性，将文化相关范畴连在一起，作整体的判断。他对地理、民族、历史等作了着重的讨论，提出了文化的地理起源论、民族生命论和三名一体论。

第一，地理起源论。

关于环境与文化的关系，钱穆不是环境决定论者，确切地说钱穆主张地理起源论。他认为地理环境在文化兴起的进程中，造就了特定的物质经济生活方式，或是游牧的，或是农业的，或是商业的，但这也还是就社会的整体概率上说的。钱穆坚决反对用物质经济的生活方式决定文化思想和政治形态，但承认物质经济的生活方式影响社会的心理倾向，进而形成某种特性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

钱穆提出：“大抵人类文化，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不同，尤要的如气候物产等之相异，而影响及其生活方式。再由其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不同，影响到此后种种文化精神之大趋向。”^①文化发生链条，是从自然环境到物质经济的生活方式，再到社会心理，最后到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组建整个文化模式。就整个文化形成的链条而言，地理环境的意义，钱穆的文本中从来没有用“决定”一词，而是用“起源”来解说的。物质的经济生活方式也不具有“决定”的地位，却有鲜明的“标识”作用。社会心

^① 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0页。